

授田證狂想

校官來會客室接我去國防部。心頭還留存著查驗及留置身分證件時浮起的不快情緒，我一言不發地隨他走入總統府後的森然建築。

「我」緊閉著嘴，「她」却遊離了出來，痛罵「我」的虛矯無能：「上回國防部人力司長找妳，要妳表達對授田證的意見，妳說忙，而且懷疑國防部的誠意，躲掉了。妳以為會拖過年底選舉，結果報紙上一登國民黨改變策略，立法院下會期便要解決，妳才焦急地反過來求見，真是矛盾加混蛋！」

推開門，握手寒暄，就坐。

「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草案擬好了嗎？」我問道。

「已經送交行政院了。先把補償原則定下，再談錢。」

我不像「她」說的那樣混蛋，平常處理事情自認相當明快，贊成就表贊成，

反對就說反對，並不怕得罪人。可是自從接觸「戰士授田證」問題，我的舌頭打結了，吞吞吐吐，像是贊成又像反對。別人聽不清，自己講不明，憋了一肚子悶氣。為什麼？

「妳真正想說的是反對七十幾萬張授田憑據糊里糊塗地抵價收回對不對？可是又怕老兵誤會，找妳算帳對不對？怕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對不對？怕妳同情弱者的正義形象受損對不對？怕學者超然客觀的面具被撕破對不對？」

我一面翻閱校官供我參閱的一疊關於「戰士授田」問題的資料，一面聽到「她」冷冷的譏嘲響起，由耳穿心。

七十幾萬張，真不是小數目。如果每張按國防部原先建議的十萬元補償回收，總共要七百多億元，約佔今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十分之一。如果這筆錢由國民黨黨庫支出，我不會吭一聲。可是處理條例一經立法院通過，就必然會動用全台灣納稅人的錢。奇怪，怎麼會有立法委員跟著反應激烈的老兵喊一張二十萬、三十萬，甚至一百萬，而不眨一下眼。有位國民黨本省籍立委的名言是：「十萬元買不到半坪廁所」，我可以想像他在請願老兵熱烈掌聲中吸收選票的得意神態。

不記得回絕過多少次老兵朋友的邀請。他們總是殷切地說：「妳是最替我們這些可憐的自謀生活老兵說話的人，現在政府不理會我們授田證折價的要求，或



自謀生活老兵走上街頭抗爭。(楊靜文攝影、民族學研究所提供)

想五萬、十萬把我們打發掉，請來參加這個座談會，為我們爭取權益。」

我完全體會他們渴求的心情，換作是我，大概也會作出如此急切的反應。我可以毫不猶疑地支持老兵自救運動對於退輔制度中許多不當措施的抗議訴求，但是面對授田憑據問題，我知道我無法喊出令他們滿意的價碼，事實上我根本不認為這是錢可以解決的問題。

「妳為什麼不當他們面把意見說明白？」「她」不放鬆地追問。

「我不忍心，我也怕面對爆炸的情緒。」終於默認了自己的軟弱。

「沒有老兵那有今日的台灣？那有你們這些納稅人？」

「台灣有七百五十億美元外匯存底，應該有能力補償我們老兵。」

每當我私下聽到某些請願老兵發出這種論調，內心都哀慟不已。是什麼樣的思想教育使他們將自己的貢獻放置於台灣其他人群之上？他們的創傷、他們的損失有多少是台灣民眾應該承擔、應該補償的？在「反攻」和「不反攻」的反覆政策中台灣的民主發展受到多少抑制？多少家庭破碎？多少人前途暗淡？七百多億美金外匯存底的炫目成果下，有多少農民、多少工人被踐踏犧牲？他們要從那裡得到補償？

「我們有一張授田憑據。國防部說不反攻不授田，什麼時候反攻？即使反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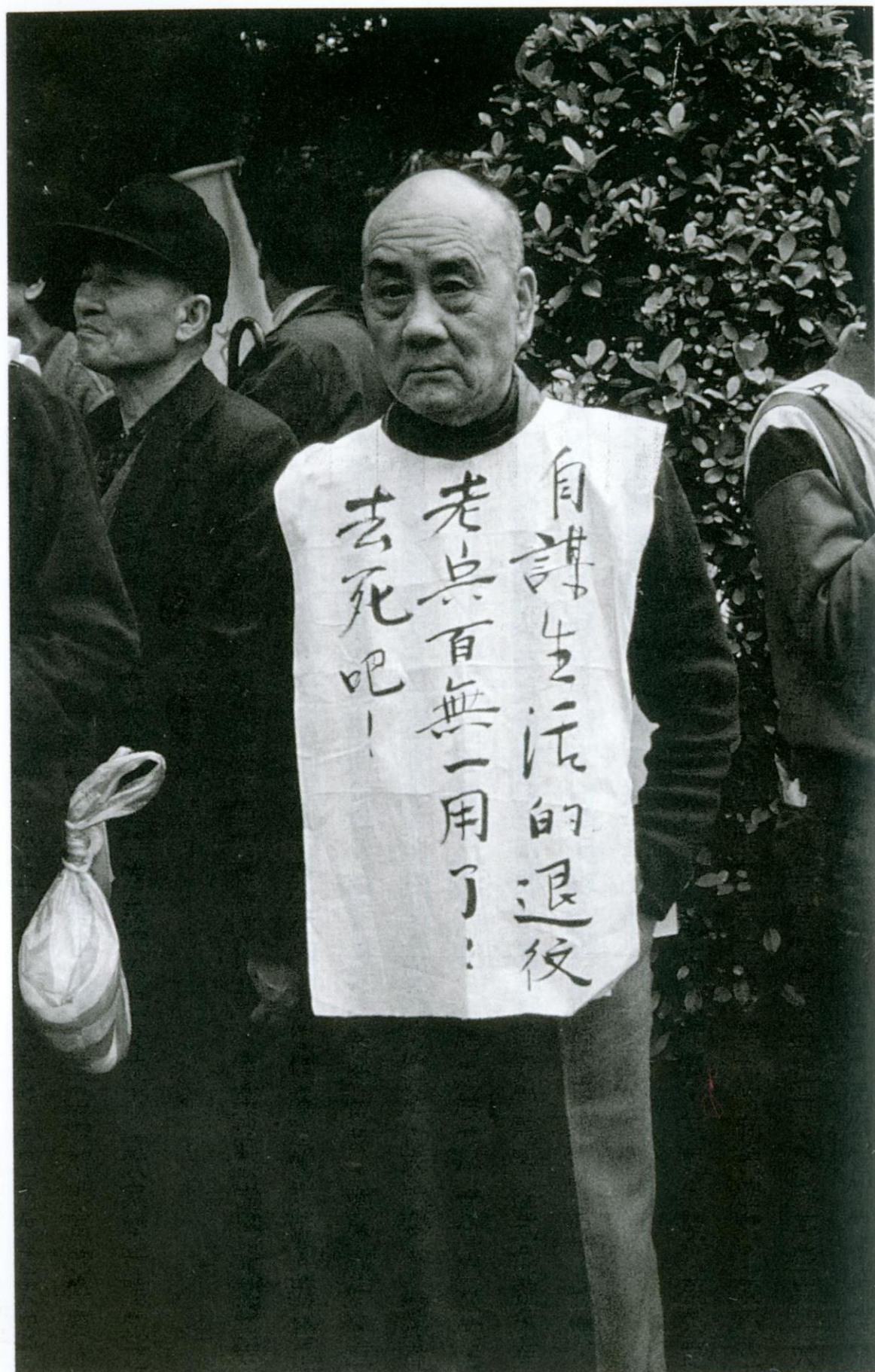
那有田可授？不是政府存心欺騙嗎？我們要求折價收回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我反覆把玩校官送我的這張淡綠色的「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憑據」樣本，咀嚼著上面的幾行文字：

……凡領得此項授田憑據之戰士，均在反共復國戰爭中立下偉大功勳和勞績，戰士授田乃為政府及全國國民對有功戰士崇敬之表示。現大陸尚未收復，故鄉父老猶在水火之中，此項救國救民國策之貫徹，有待三軍將士協力完成之。

我不只接觸那些請願的榮民，在與各類型榮民交談中發現，凡是於合理的退伍除役制度建立後離營者對於「授田憑據」大多沒有什麼要求，因為解甲雖未歸田，但也得到應有的報償。其中服役年資久，享受到終身俸的就有二十四萬人，而且比一般國民獲得政府更多的照顧，譬如繼續領眷糧、水電半價，子女一直到大學的教育費幾乎全免。高階級退伍者還可以轉公職或輔導就業弄個「顧問」頭銜，每個月有額外的薪資收入。至於他們的特殊戰功早就於退伍時支付過特別獎金，無需「授田憑據」錦上添花。他們對於「授田憑據」折價收回訴求的看法，剛開始是認為那些請願榮民受了「有心人士」的利用而大不以為然，繼而袖手作壁上觀，「那些人如爭取到我自然也有份，不無小補。」

「納稅人的錢如用來作這樣的補償妳覺得不公平對不對？」「她」鼓勵我傾吐



(楊靜文攝影、民族學研究所提供)



自謀生活老兵走上街頭抗爭。(楊靜文攝影、民族學研究所提供)

心中的不滿。

「我也有一張授田憑據。」年輕的校官坦率地承認。「可是，我把它放在抽屜裡，從來沒想到它會換成錢。」

像校官這樣在台入伍，服役五年便獲得授田憑據者將近十五萬人。當兵是他們自己選擇的職業，退役時已按規定拿了退役金，從來不覺得自己立下什麼「偉大功勳和勞績」，也未曾奢想反攻大陸授田，更不會為授田憑據走上街頭抗議。另外，經過特殊優惠特考或介紹而轉任公教人員者有六、七萬人，其中有的人領了雙份退休金，有的則因爭取早年軍中年資合併計算未果，才轉而要求授田憑據折價收回。

民國四十年授田條例公布和授田憑據發放之時還沒有建立退役制度，「授田」是激勵士氣、安定軍心之妙方。後來未能反攻大陸，便有了制度化的退輔措施，以安定榮民之生活。只有那些在退除制度建立前退伍，而且退而未能安者才理直氣壯地強烈要求「授田」。這樣的人以民國五十年六月卅日前退伍的低階士官兵為主（軍官四十一年以後便有退除役辦法），大約有十萬人。不過目前大多數早年自謀生活者經過自救運動之爭取已進入榮家就養，每月可領五千餘元生活補助金。

「妳究竟想要表達什麼？」「她」聽得有些不耐煩。

我的意思是：在合理的退除役制度下退伍者並沒有堅強的理由要求納稅人出錢，補償收回他們的授田憑據。

此外，在歷年有限的社會福利支出中用於榮民身上的金額相當高，退輔會今年的預算就超出一百五十億，再加上軍人退除給付約五百億，則接近七百億。而今年社會福利預算雖有提高，總數不過一千多億。如果還有榮民未受到照顧，那是退輔會和國防部執行上有缺失，其責任不該由納稅人來承擔。榮民在台灣社會中實在比其他群體受到政府更多的關注。想想，農民保險好不容易今年才通過實施，而榮民早在二十年前就享受到免費醫療的福利。

「這麼說授田憑據都不需要補償囉？」「她」顯然為這樣的推論嚇了一跳，不太能接受。

那些老兵，尤其是未得到合理退除役金，又孑然一身、親人離散、貧病交迫者，真應該多給予一些補償。可是他們人生之不圓滿又絕非幾個錢可以補償的。不用說二、三十萬不夠，即使一、兩百萬又何嘗能夠彌補他們為「反攻大陸」（更正確的說法是「不反攻大陸」）所作的犧牲？區區一小張授田憑據能載得了多少愁悶和多少希望？如果要補償，這筆歷史的債是不是該由長年以來已付出大量代價支持退輔體系的台灣納稅人負責償還？

我要求看授田憑據處理條例草案。校官雖有些遲疑，還是拿了出來。

立案緣起部份提到授田憑據之處理僅能依照補償原則，因「大陸國土未復，依規定不發生授田問題」；也不是發給退伍金，因現今「國軍退輔、安養制度日趨完備」。每份憑據補償收回時不但有價，而且傾向於等價，分先後次序兩年內發放完畢。補償金及作業經費則由行政院訂定，編列特別預算支應。

如依照某位學者的建議，按耕者有其田辦法收購授田憑據，則「每名戰士授予年產淨燥稻穀二千市斤面積之田」折合穀價，每張價值將近五萬元，七十幾萬張（包括加成授田部份合計三萬張）的補償費要三、四百億元，真是錢從何處來？而且最令人氣悶的是半數以上授田憑據的持有者並不真正需要這筆錢，而抗爭激烈者對這樣的金額絕不會滿意，仍要抗爭。付出這麼大代價，如此這般地為國民黨解決積欠某些老兵的歷史及感情債務問題，納稅人是傻瓜嗎？

「有一位學者在聽證會上本來想從社會公平性的角度分析授田憑據補償問題，結果一見到那些情緒激動老兵拼命的姿態，就嚇得把話縮回去了，只好頻頻說老兵對國家社會實在非常有貢獻，應該給予補償。」校官洞悉了我的矛盾，安慰地說。

「那麼你呢？你覺得怎麼樣？」我對於這位處理授田憑據問題長達四年之久

的年輕校官產生好奇。

「這是很特殊的經驗，有的時候忽然覺得想通了，隔天又陷入迷霧。每天差不多接到二、三十封老兵的信，大多發洩仇恨、不滿。要錢，而且要得多。聽證會、座談會遇到他們時我不會認為他們無理取鬧，他們有這樣的理由。妳有沒有看過『新世界之旅』這本書？」

我怔了一下，「新世界之旅」不是一本翻譯的人類學著作嗎？作者Carlos Castaneda生動地描述他向一位印地安巫師唐璜（Don Juan）學習巫術却得到深刻人生領悟的經歷。校官居然看過這本書，但這和授田憑據有什麼關係？

校官覆述的是唐璜講的一個故事：

有個沒有家、沒有親友的窮苦印地安人在市集上匆忙行走，絆倒在一個老人身上，老人的葫蘆滾到一邊。印地安人將老人扶起，又堅持幫他背沈重的葫蘆，並問老人葫蘆裡裝的是什麼，老人沒回答。不過老人喚來一隻美麗、閃閃發光的「神鹿」，然後告訴他如果想擁有這頭鹿和牠的智慧，就必需還回葫蘆。

印地安人貪婪地問：「你的大葫蘆裡究竟裝的是什麼？」老人平靜地回答：「裡面裝的只是尋常食物：炒米粉和水。」可是印地安人一個字也不相信，他想葫蘆裡一定有寶物，結果選擇了葫蘆，放棄了神鹿。他跑到無人的地方把葫蘆打

開，裡面果真只有食物和水，他一氣之下把葫蘆摔碎在岩石上。

「愈虛幻的東西誘惑力愈大，可以盡情幻想。失望，源自本身之不健全。」
校官說出他的領悟。

「她」和「我」一樣靜靜地聽著這個故事，走出國防部大門，「她」自動回到體內，給予我溫暖的擁抱。

（原載於78年10月16日中國時報）

走出野蠻台灣

說也奇怪，提筆的此刻居然幻想手邊有根煙，做那我從未試過的反覆吞吐的動作。

不瞞您說，我不是一個具有救世熱情、慈悲奉獻的人，一向對道德重整、慈善事業反應冷淡，對政黨、社團敬而遠之，除非自私地想滿足學術研究興趣。

可是自從一年多前婦女救援協會成立起，到近日變更爲婦女救援基金會止，我雖不積極却持續地成爲這組織的成員，連自己都有點訝異。

那天行色匆匆地走在陽光燦然的高雄市街上，基金會的董事長王清峰律師開口了：「你捨近求遠，來這裡了解問題！」我只臉紅了幾秒鐘便恢復正常。

一則晚間電視新聞把我們引來高雄。螢光幕上快速閃過高雄刑警大隊凌晨突擊某一應召站捕獲涉嫌販賣人口的主持人、保鏢和七名少女的鏡頭。次日北部版